

固本求新

孟庆枢 著

孟庆枢教授讲中国比较文学的新视野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王向远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固本求新 / 孟庆枢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 王向远主编)

ISBN 978-7-5117-2241-6

I. ①固… II. ①孟…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日本 IV. ①I206 ②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9122号

固本求新

出版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邓彤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52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 326千字

印张: 25.25

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作者简介

孟庆枢(1943—),长春市人。东北师范大学首批资深教授、日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长春理工大学中日比较文化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赴日本国学院大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赴莫斯科大学研修中俄比较文学。

承担七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8项(全部完成)。已出版《孟庆枢自选集》《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等专著5部(含合著),主编《西方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在《人民日报》《外国文学评论》《日本近代文学》(日本学术杂志)等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日文、俄文译著300万字以上。如《川端康成论》《别里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等。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起步发展，到现在为止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已经有了丰厚的知识产出和思想建树。它的异军突起，是当代中国一道引人瞩目的学术文化景观，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鲜明印证，也是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

三十多年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史已经表明，要在人文研究及文学研究中建立世界观念和视野，要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研究，要把外国文学放在中国文化立场上加以审视和阐发，要连接中外文学，要打通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壁垒，要把细致微观的实证研究与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相结合，那必然会走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在这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比较文学”是学术观念、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世界文学”则是学科资源与研究视野。它在贯中外、跨文化、通古今、越科界的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上的优势，使其无可替代地成为当代中国学术文化中最有时代性、最有包容性、最有创新性的高端学科之一。

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不仅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等方面生产了大量的新知识，而且逐步建立了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理论普适性的学科理论系统，逐步完善了比较诗学、中西比较文学、东方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等分支学科，在学术成果的质与量

上已居世界各国之首，还全面进入了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从而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当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和中心，代表着世界比较文学兼收并蓄、超越学派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收在这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的作者，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上，是继季羨林、乐黛云等老一辈学者之后的第二代学人。这些作者固然只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一部分，却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现年多在四十五至六十五岁之间，从学术年龄上说大体属于中壮年，都是各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大都在1980年代后走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道，1990年代后崭露头角或脱颖而出，进入20世纪后的十几年里，更成为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他们有幸拥有了可以安心治学的环境，赶上了数字化、信息化的新时代。既抬头看世界，又埋头务笔耕，既坚持学术的严谨，也保持思想的活跃，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充分发挥了中国学者的学术优势和想象力、思考力、创造力，取得了与时代要求相称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是个人学术履历的证明，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份奉献，更成为新时代“国人之学”即“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二十卷，选题上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理论为主，以讲述和示范学术方法为要，涉及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基本理论、比较诗学、东方文学及东方比较文学、西方文学及中西文学关系、世界文学总体研究等方面。各卷均按一定的范围和主题，将作者有原创性、有特色的成果收编起来，将大学讲堂搬到书本上来，以读者为听众，以写代“讲”，以言代“堂”，深入浅出，以雅化俗，汇集中国比较文学第二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以使五指成拳、十指合掌，形成大型丛书的规模效应，得以占书架之一角，入读者之法眼，从一个侧面展示近年来中国比较文

学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而且，不同作者及著作之间也可以相互显彰、相互映照、相互补充，读者也可以在异中见同、同中见异，在参读和比照中领略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和世界文学，得窥比较文学殿堂之门径。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资助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支持，编者和作者深表谢意！

愿“讲堂”满座，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事业更加繁荣！

王向远

2014年4月20日

自序

这本《固本求新》承王向远教授的策划得以进入到中央编译出版社这套丛书的行列。作为我个人，对自己的书忝列在“名家之作”的行列有些惶恐不安。不过它记录了我在中国比较文学领域探索的步履，又多了和广大读者交流的机会，内心又非常欣喜。我确实和中国比较文学一起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三十多年岁月。其中的人生滋味回味起来，颇多感慨。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其实真是幸运者。我们紧赶慢赶遇到了盛世，虽然和当时更年轻的人比较起来有些迟暮之感，但是毕竟登上了改革开放的列车。我们有幸成为中国比较文学重新崛起的参与者、建设者，中国比较文学助推了我们的个人成长。为此，当进入古稀之年的时刻，回眸走过的路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比较悠久，具有革命传统的大学。成仿吾曾是我们尊敬的老校长。很多科系名师辈出。仅从中文系来说就可以开出一个让人羡慕的大名单。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她也饱经沧桑。记得在大学念书时一位颇有人生经历的学者教授我们外国文学课。在那个时代出国访学，是一般人不敢做的梦。而这位先生是敢做梦而不能成真。在一次面对全系师生（还有外单位学者参加）的学术会上，他直言不讳地讲，自己搞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去不了苏联，搞印度文学没到过印度，搞的是“纸上谈兵”，空对空。今天看来很合理的诉求，可是在那个时代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发牢骚”、“对什么不满”（还好，据说此事没被太追究）。这件事在我的心灵打下了

不可磨灭的烙印。我在不足 22 岁之时竟然成了这个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教师。当时和蒋锡金先生在一个教研室。蒋先生是位随和、亲切、率性而行的学者，他很喜欢青年人。每次教研室开会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挨着坐。自然请教的机会多聊天的机会多。谈得高兴时，他会叼着不离嘴的香烟，抚着你的肩膀，发出童稚般的笑声。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享受。不过不太长时间有人就提醒我说，蒋先生还没摘“右派”帽子，要注意自己的思想之类的警戒的话。我颇感震惊，小小的屋里还有如此惊涛骇浪——我们这代人讲这些有点像说故事，可是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隅。我们有幸在青年时代的尾巴年龄段上赶上了改革开放。说别的也许会谈远了，总之改革开放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它使我们思想松绑，走向广阔的天地，让我们敢于做梦，进而使梦想变成现实。七十年代后半系里叫我上外国文学课，其中原因也许考虑到我曾经在文革期间普查过前苏联报刊（和孙思缪老师），对于中国文学还有一定基础。其实正如我这个东北人一样，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在学业上也向几个领域探求。我曾经在著名中国文学史家杨公骥教授指导下认真地学习、研究过李商隐（至今仍在学习中）。在 1976—1977 年还去了李何林先生主持的鲁迅研究室参加鲁迅日记注释工作，拜访了包括巴金先生在内的大师、先贤，走遍了大江南北，体会到文学的人文精神。改革开放伊始还和金涛一起撰写了《鲁迅与自然科学》。七十年代末我从翻译介绍苏联科幻小说入手（是金涛同志组织，我选编了我国第一本苏联科幻小说选《在我消失掉的世界里》，接着又和诸位同仁一起搞了苏联科幻大师别里亚耶夫的科幻全集），把翻译和研究结合起来。面对一个新的春天，总是觉得时不我待，不断地催促自己多学一些再多学一些。这是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的普遍心理。我把在“文革”中处于地下的日语学习公开，在条件不充分的年代花一笔稿费（记得是 180 元，在那时是不菲的一笔钱）买了砖头样的录音机，缺乏外教就到长春的新民广场和见到的日本客人对话，我把那里叫做“广场大学”。（这个称呼后

来流传开来)。每一天是充实愉快的。一位亲人曾经说我是很辛苦,但是也是很幸运的人。这话我完全接受。说起辛苦干哪行哪业不是各有艰辛吗?说到幸运对于我来说则是在学习的道路上多有贵人相助。为此自然形成了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恩师孙晓野教授是我终生不忘的恩人。我虽然没有承继先生的学业,但是这位享誉中外的古文字学家,人品学品可以说炉火纯青,从他身上我懂了学问的真谛。他从不言己。一次一个不起眼的青年刊物要我写孙先生的治学,由于我的诚恳和系里一位领导的帮助,他和我谈了三个半天。可以说,先生的风范永远成为我心里的一盏灯。改革开放伊始,我巧遇了我校著名俄语语言文学研究家韩志杰教授。她独特、传奇、坎坷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本书。她的纯正的俄语、广博的俄罗斯文化修养让人感叹。她指导我通读了普希金全集,翻译普希金的诗,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益。没有韩老师做后盾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本苏联科幻小说选《在我消失掉的世界里》和“别里亚耶夫科幻”全译。1991年我到莫斯科大学访学时到她在彼得堡的住处看望、拜访,没想到竟是最后一面。是她从知识和教养上圆了我的俄罗斯文学梦(还有北大李毓榛教授的鼎力相助)。八十年代中期,父亲的日本学友野口明太先生费尽周折重新联系上我父亲,他和夫人成功访华,看到我后鼓励我去日本留学。在他们的帮助下,居然我又把一个梦变成现实。我到日本留学后,有幸接受著名学者长谷川泉和阿部正路教授的指导。他们的严谨学风、敬业精神、对我的谆谆教诲,我终身不忘。两位先生几乎把自己的每部著作都赠予我。两位先生领我搞了很多“文学散步”,实地踏查一些经典作家的文学、人生之旅。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真挚情怀进一步坚定了我从事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决心。正如阿部先生后来讲的“我们都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架桥人”,先生是按这一思路打造我的。至于很多真诚帮助我的日本友人要开出很长的名单:福士稠子女士在我赴日不久就给我安排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帮助我学习日本文化,她一无所

求,只是希望我成为一个好的学者。专修大学的土屋昌明教授一直关心我的研究,每每在关键时刻赠予的资料都起了重要作用。要讲的很多很多,这里只能从略。在中日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中,戈宝权和乐黛云先生和我有着不解之缘。1986年秋天,戈宝权先生和夫人梁佩兰女士访日,我陪同先生访问了丸山升教授等著名学者。戈先生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他希望我回国后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搞起来。在1987年晚秋时节,我回国和妻子应梁夫人盛情邀请,住到干面胡同的戈先生宅邸。不仅聆听了很多教诲,而且先生还打电话介绍我去见刚从国外回来的乐黛云先生。乐先生是刚刚成立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秘书长。她在中关村的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成为建立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动力与契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心存感恩之心时时想如何报答。中华民族历来讲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作为一介书生,或者在讲坛上的教员,所谓报恩想来想去觉得靠谱的是对于自己事业的忠诚,把应该做的事情干的像个样子。1998年我们学校让我参与申报日语语言文学博士点,一举成功。这给了我们新的平台、新的机遇,在和我的博士生的共同学习中,也深感工作的意义重大、担子很重。记不得具体时间了,我在和弟子交谈中谈了我的一些想法“我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准备为自己从事的事业拼搏终生;搞比较文学为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强国中增添正能量,我们都是怀有这一梦想的思想者;我们要尽量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知识,生也有涯,学也无涯;要固本求新,在立足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借鉴域外优秀文化,而且突破学科藩篱,在‘打通’上下工夫,不断超越自我;我们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站在学术前沿;归根结底就是以创新作为起点。”后来有的弟子把这些话精炼了一下,记在他们的本子上并且发表。我觉得那就作为我们的共勉吧。反复斟酌即将付梓的书稿叫“固本求新”的因由即在于此。不敢标榜已经建立了什么新的体系,有什么石破天惊的高见。但是,我确实有这样的自信:在经历了30余年的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

漫长历程之后,我们在逐步走向成熟。至少对中国比较文学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我所说的共同成长即是如此。

把书名定为“固本求新”在于明确我们的文化强国必须立足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中国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98 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既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又强调了文化的多元性,即重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财富。人类不分南北东西,共通之处成为沟通的基础;但是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体现的“新”,是互相借鉴、学习的前提。在学习中为我所用的转化就是创意所在,也是创新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世界的文化生生不息,保持健康发展,永不衰竭。当今人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果坚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同时又要注意克服“文化部落主义”的话是可取的。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比较文学诸问题的探讨从深层次上说也是对“文学”的再认识。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每天都可能思考这一问题。学问的创新实质上是思维的创新。动态地理解“文学”,是与时俱进的思考。近代意义上的“文学”产生于西方,“literature”直译成“文学”(转手于日本)。它的内涵越来越使人们感到困惑。我们始终是被囿于这“自明”的范式之中。然而,正如彼德·威德森所说“在 20 世纪后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术语,已经大成问题了。”因为以前的“文学”概念无法承载当今的种种变化,并束缚着人们的思维。一位日本学者面对这一相同问题时讲到“依据近代的概念对古代、中世纪的文艺作出的判断,是不能立足于它们产生的时代来理解它们的。近年已开

始对其进行真正的反省。”^①在日本,近年频频出现“文学的死亡”、“文学的终结”的声音也不足为怪了。这就是对“文学”的重新叩问。

动态地与时俱进地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促进我们克服一些成见的束缚,使之具有新的视野,开拓出新的研究天地。比如说,影响是挂在比较文学研究者嘴边的话。随着对我国古代文论学习的深入,梳理西方文论不同时期的不同理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从西方的作家、作品论到阐释学、接受美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文本论等都可以感受到人类在接受、认识问题上其实存在着一条动态的发展的轨迹。置言之对影响的认识的深入就是克服线性思维的过程。我国古代以《易》为代表的元典话语充满动态精神,在文学上“典故”的妙用,堪称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可惜的是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与弘扬。我们头脑里“文本间性”在驰骋。这么讲并非是贬低克里斯蒂娃,我只是觉得我们在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中还欠缺了一些什么。收在本书的围绕文学史书写、翻译、诗学研究等方面的问题意识都是这一思考的产物。翻开我们的外国文学史(包括我本人参与撰写的)有许多问题应该尽快解决,所谓超越,首先是对自我的超越。中国比较文学这一平台推动了这些想法。这是我非常珍惜的。因此这些年下来发表了一些一得之见。如果环顾大千世界,觉得在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是持有相通之见的。比如对于翻译研究,美国著名学者达姆罗什通过《吉尔伽美什》的翻译、传播的重新阐释从深层次揭示了“文学的变异”。这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哲理思考。在这一思路他对歌德“世界文学”的再认识就更有现实意义。我们的时代在走向综合,学科的细分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积极、有益的条件和方法,但是同时也带来负面的弊端与障碍。比较文学研究在围绕“跨学科研究”的突破是有重要意义的。可以说,在比较文学领域很敏感地体现了顺应时代要求的趋向。不尚空谈,重视基础工作是我

^① 铃木贞美《思考日本的“文学”》,角川书店,平成六年,第9页。

们的又一思考。它体现在要把一些必要的基础知识讲透,而且紧密结合文本,为此结合川端康成谈谈文学与美术的关系旨在举一反三。

本书强调中国比较文学应以日本为参照系,这不仅仅出于自己的知识结构的原因,而且绝非忽视包括欧美在内的西方文化。道理很明显,日本同处东亚,是汉文字圈国度之一,她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是非曲直,足资借鉴,是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作为一个研究者这是从多年实践中得到的一点启示。日本在古代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润,近代以来又始终处于和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漩涡(但在深层次上仍与中国文化有割不断的关系),为此在日本发生的东西文化交融中的经验、可从另一角度做立体思考。在过去的许多研究著述中关注、记述了近代中国借助日本这个“窗口”、“桥”而了解西方和借鉴西方的作用,这是确实的,也有必要。但是,如果将日本文化的作用止于此,则是片面的。其实,在近代史上,日本了解西方有相当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当时中国译介西方的一些著作倒是早于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译著。我们应该不仅重视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对西方的了解,而且更应深思日本是如何消化、吸纳西方文化的过程。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文坛处于多元态势,其根本原因是西方多种文化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得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更为激烈,它被评论界称作日本文坛的“转型期”。对这一阶段的日本文学进行全面了解就必须考察这20多年的日本主要作家、作品、评论、文学机构和文学奖项、重要文学活动(特别是一些争论)。在世界文化动态的网络中展示日本文学发展的律动,是以日本为参照系的重要内容。我们以日本为参照系,在于更加深入探讨西方理论的复杂性,揭示日本如何吸收、改造西方理论,其结果(当然有的还在进行中)如何,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非常有利,也是固本求新的重要组成。当今,我国正处在新一轮东西文化交融的高潮之中,自觉地、清醒地认识其中的规律很具现实意义。

任何国家的文学都是与时俱进的,是个变化不居的动态过程,而绝非是个客观静止的存在。研究日本文学必然要动态地把握。和其他国别文学比较起来,也许在翻译介绍上,对日本文学在译介上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在研究上则显滞后。这其中一个很主要原因恐怕是对日本文坛变化跟踪得不够。收入本书的十几篇文章显然只能体现这一思路的一部分(这是个大工程、长期工程,要许多人坚持做下去)。通过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日本同仁在比较文学的重大问题上,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可以成为他山之石。其中像小森阳一这样的前卫的理论家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些。他的新锐眼光,理论勇气,值得称赞。感谢包括小森阳一、黑古一夫、野家启一、坪井秀人、岛村辉、土屋昌明、中村三春等日本学者,慨然给予我们翻译委托书,提供了交流的便利。

本书还想和诸位表白的是我们始终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的元典话语。人类自从成为文化人以来,始终和阐释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我们永远处在一个“古今中外”交错的时空网络之中,每时每刻无不在进行各式各样的“对话”活动。作为整个地球的人类,由于具有共通的“文心”与“诗心”,这是他们的不同文化可以交往的基础,然而,“文心”“诗心”的“同”与“异”又总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如果形而上地片面地追求“同”或“异”又将陷入另一误区。我们有必要反思对于“理解”的理解。如果把理解局限于人的认识方式,显然还停留在主客的二元对立,把对象当成一个既成之物,似乎是从中汲取一些什么,达到穷尽即是认知的终点的目的。显然,这是不符合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如果借鉴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观点,我们会把它看作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样“理解不可能是客观的。理解不仅是具有主观性,而且还受制于‘前理解’,一切解释都必然产生于某种先在的理解。阐释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新的理解,这种

新的理解又将作为进一步阐释的基础,如此不断循环延伸”^①。这就告诉我们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理解永远是一个开放的、永远处在一个时空延续的过程,这正是人的存在的本质体现。出于这种考虑,我不揣冒昧,在一些见解上和业内的同仁坦诚交流、交锋,为的是抛砖引玉,求得友声。如有不当之处,请理解。要说的许多,但是作为自序如果太多是讨嫌的。有拙文在,请拨冗指正。百年的中国比较文学走过了不平常的路程。当今又到了一个关键阶段。我觉得仅从教学来说我们的有关课程如何改革已经提到日程,一些面向 21 世纪的课题如何开展都大有作为。我们应当为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作为比较文学领域的一名老兵,不仅自己还要发掘些微的能量,更期待年轻一代的壮举。中国比较文学任务艰巨,前途光明,我期待着更好的梦想成真。

孟庆枢

2014 年 3 月 18 日于北京常青藤寓所

^① 陈惇等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451 页。



目 录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	王向远 1
自 序	1
比较文学理论发微	1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	3
中国比较文学与“和而不同”	33
翻译世界中的“你”、“我”、“他”	45
比较文学学科史	64
影响研究再认识	87
再论重构外国文学史	111
中西文化与中西文论	125
新时代,新视野,新诗学	
——史忠义教授《中西比较诗学新探》等著作读后	134
比较文学与后现代主义理论	149
用创新迎接民族文化复兴的美好明天	
——从“文本间性”与“典故”对话谈起	162
文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研究	167
乐无意故能涵一切意	177

文学与美术的比较研究	
——以川端康成与美术为中心	187
日本：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参照系	203
克服“自明”，促进交流，加深理解	
——以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为中心	205
日本比较文学概论	218
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史构建	
——以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建构为中心兼	
中日文学史比较研究	236
对日本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几点思考	257
当代日本后殖民主义批评管窥	270
全球化语境下的日本当代文学理论	
——从作品论到文本论、超文本论	287
立于实证的综合文学评论	
——评长谷川泉“三契机说文学鉴赏七十则”	302
创新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	
——小森阳一文论译后记	313
对于“比较文学”的反思	
——小森阳一《溢出规范的日本文学》总论译后记	320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的“复活”	325
评高桥和巳的《李商隐》	335
返归原点 旨在创新	
——读中村三春的几本新著	353
后 记	360